



受冤者的「彼岸」

冤案紀錄片導演

施佑倫

受訪者 | 施佑倫 / 知名紀錄片導演

採訪者 | 駱安琪、張藝藝、江乙容、葉子寧





冤案紀錄片導演——施佑倫

施佑倫畢業於政治大學廣電系及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後來前往美國攻讀美國雪城大學電影製作碩士，目前於大葉大學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授課。

2014 年起，與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合作拍攝司法冤案紀錄片，《彼岸》為其第一部長片，入圍 2021 釜山影展超廣角紀錄片競賽單元，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其他作品：《不排除判決書》獲金穗獎最佳紀錄片、《鄭性澤的 48 小時》入圍香港華語紀錄片節。

「冤案」——踏入紀錄片的敲門磚

施佑倫最初拍攝的作品為 2014 與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以下稱平冤協會）合作拍攝的《不排除判決書》，施佑倫起初並未將其視為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及心力雕琢的作品。在那時，他還未曾想過，在往後的漫漫長日裡，自己會投入冤案紀錄片這個領域，拍攝出一個又一個震撼人心的冤案作品，用影像紀錄的方式讓這些含冤的人被記住。

促成《不排除判決書》紀錄片拍攝的緣由僅僅是個偶然，當時平冤協會找了施佑倫的學妹合作拍攝陳龍綺案（《不排除判決書》紀錄片當事人），但因學妹已進入製作公司，無暇拍攝，而將此案件轉介給施佑倫。對施佑倫而言，自己並非法律相關背景出身，也不熟悉冤案這個領域，因此最初僅將《不排除判決書》視為一件「案子」，而非一部「作品」。在接下案子後，施佑倫循著正常的拍攝流程，開始與平冤協會接觸，透過卷宗瞭解陳龍綺的處境。在他和陳龍綺接觸後，發現陳龍綺是個非常願意闡述心境，也很善於表達想法的人，恰恰符合了施佑倫心中「適合作為紀錄片主角」的角色。從此時開始，施佑倫開始思量將此案件作為作品的可行性，並對此案件改變想法，嘗試將其作為自己生涯的代表作。



轉換心境的施佑倫主動向協會提出願意自己籌措經費，並運用自己在紀錄片這一行業的敏感度，著手將案子呈現為企劃案提交給公部門以及各種機構申請補助經費，以彌補當時 NGO 普遍缺乏經費預算的危機的經費缺口。而施佑倫與平冤協會也達成協議，所有其申請到的經費都會是完完全全用注入於紀錄片的拍攝，而所有其製作出來的作品供平冤協會做使用，不收取分毫版權費。

除了在經費的問題上有找到解決之道，平冤協會同時也給予施佑倫相當大的彈性空間進行拍攝，且主動提供所有與案件相關的資料，比如說卷宗、判決書、起訴書等等，只為了讓施佑倫能夠以最貼近的角度去感受、拍攝被攝者的生命故事。在平冤協會的高度尊重之下，施佑倫的作品在創作過程中可以專注地在被攝者的生命故事之上，而非淪為價值呈現的宣傳片。



如何認定案件是冤案？

施佑倫很直接的回答：「我也不知道耶。」

他解釋平冤協會提供的案件卷宗跟判決書，讓他了解檢察官跟律師兩方的說法，起初自己立場也不堅定，覺得雙方好像都有各自的道理。於是他也曾經對協會提出了同樣的疑問：「到底如何認定一個案子是冤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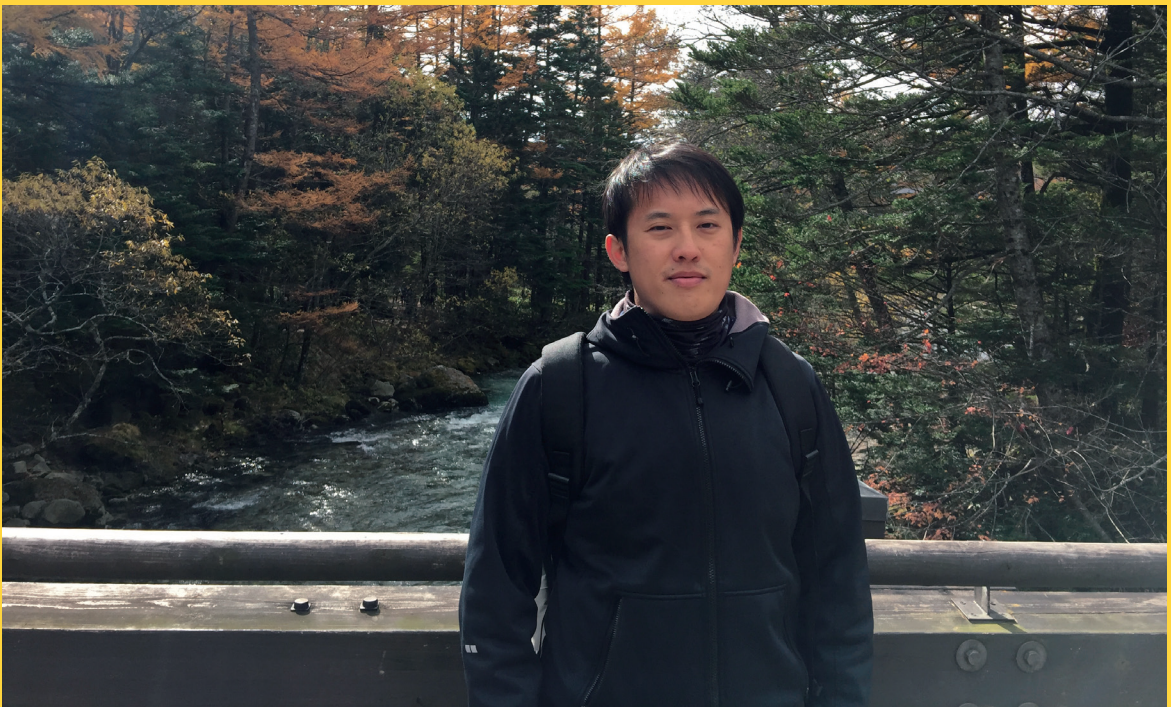
對於平冤協會來說，法律程序的問題，以及案件有沒有科學證據的立足點，是審核的兩大標準。透過這些觀點去提出質疑、找出不合理的地方，最後才可能被認定為冤案。而對於這樣的審核方式，施佑倫表示他基本上都會相信協會的立案標準。

除此之外，跟當事人大量接觸對施佑倫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透過長期相處和觀察的這種方式，能夠自然而然對案件及當事人產生不一樣的感覺跟感受，久而久之就會有自己的判斷，對於冤案與否，也就能夠有自己的認知及想法了。

願意相信當事者無罪的契機

「曾經也有剪接師問我，『你真的覺得當事者沒有罪嗎？』，我說我的確不知道他有沒有犯罪，但如果今天沒有足夠的證據，我認為就應該判定無罪。」施佑倫語重心長地說道，「我覺得我們的法治就是無罪推定論。」，施佑倫表示，雖然他可能也會對當事者感到懷疑，但他的懷疑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認定當事者有罪，就只是懷疑而已。若是因為懷疑就要將當事人定罪，那和白色恐怖時期有什麼不同呢？

他接著提到，在拍攝《彼岸》這部作品時，當時的律師團成員，同時也是現任行政院發言人的羅秉成律師和他說，「不管是檢察官或是律師，其實案發時我們沒有人現場，而且案發現場也回不去了」，羅律師提到，在認定判決時較公平的做法應是客觀的從物證進行是否有罪的判斷，若是物證不足以證明當事人有罪的情況下，那就應該秉持著無罪推定原則，預設當事者無罪。



TAIPEI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2021

北 金 馬 影 展



紀錄片是一個行業？

「我爸媽在幾年前都還不太了解紀錄片，包括我自己都在懷疑紀錄片真的是一個行業嗎？」施佑倫坦承的說，因為他算是接案的自由工作者，在尚未有成績時，連他自己都曾懷疑真的可以光靠接片子過生活嗎？不僅如此，施佑倫的父母也對紀錄片到底是「行業」還是「興趣」有過質疑。

而回憶到親友的質疑時，施佑倫這麼說：「第一次開始拍的時候身邊親友當然有疑慮啊，沒事幹嘛去拍一個爭議性很高的題材？」但他當時選擇「走一步算一步」。在拍攝冤獄的過程中，陸續參與幾次審案會議，施佑倫也逐漸相信平冤協會在做的事，以及認為自己正在進行的拍攝是有意義的。



在紀錄片連續拿到兩三個補助案後，親友間的態度逐漸轉變，近年拍攝的作品像是《彼岸》等有開始入圍國際上重要的影展，像是釜山影展及金馬影展，家人也因此更覺得施佑倫正在做的事是有意義的，否則也不會入圍。施佑倫笑著說：「要說這是虛名嗎？其實好像也算是。」他表示虛名對於紀錄片這個行業，確實是有可以穩定家人的功用，故作品得到肯定對於施佑倫而言還是很重要的。

從默默無聞到成為入圍並獲獎的導演，施佑倫才發現：「紀錄片真的有可能從興趣成為一個職業」。

施佑倫提到，若是想要做紀實性的影片，其實有很多工作的可能，許多電視台都有一些紀實性的節目，但電視台的常態編制並不足以支撐所有節目，因此很多節目中的技術人員都是外包的，那接案型的自由工作者就可以去當節目的技術人員。

經費與觀眾之間的矛盾

近年來，文化內容策進院時常編列預算給影視工作者申請補助案，且每項補助案的補助項目都分得很細，從劇本開發、前期製作、特效、動畫等影像製作的細項皆有相對應的補助可以申請，代表這個產業會一直有人在拍攝紀錄片。施佑倫認為：「現在的環境不怕沒有經費，只怕你沒足夠強的內容故事或想法。」

同時也存在另一個危機，打開像是 Netflix 的這種串流平台，會發現在裡面搜尋紀錄片這個分類項目，台灣的紀錄片或是紀實性的節目比起國外，其實是相對少的。近幾年的串流平台，開始大量投資影視作品，像是常常能看到哪一部電影或是哪一部劇是 Netflix 投資的，同時也入圍威尼斯影展甚至奧斯卡影展，然而 Netflix 有一套他們的投資標準，但為什麼台灣的紀錄片產業還沒有達到 Netflix 的一些標準呢？是不是代表台灣紀錄片不太符合國際的標準或眼光？就他的觀察，其實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已經開始跟台灣劇情類的劇集合作，可是紀錄片是沒有的，大多數都是直接購買播放，並不是從製作時期就開始合作的。前幾年因為疫情，導致於大家不進電影院看電影，所以串流平台開始蓬勃發展，也勢必是日後影視投資很大的一個市場，可是台灣紀錄片還沒辦法得到這部分的支持，這是施佑倫覺得目前紀錄片面臨比較危機的問題。

分析紀錄片產業飽和度

聊到紀錄片這個產業情況時，施佑倫坦承自己目前在大學任教當中，大部分同學都喜歡較「便利」的形式，例如：YouTuber、直播。時下的社會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史的變遷，大多對於紀錄片甚至是電影長片已不再感到興趣。

然而，這也並不代表就是面臨「產業飽和」。施佑倫認為，這個社會仍然需要紀錄片，因為紀錄片有其教育的意義。如同觀眾是多元的，有看商業電影的觀眾，也有看藝術電影的觀眾，當然也有看紀錄片的觀眾。

施佑倫分析，在 2000 年初的時候，當時是台灣商業電影最慘澹的年月，而藝術電影仍屹立不搖。當時侯孝賢、蔡明亮等大師導演在國際影展上屢獲佳獎，但社會上卻出現一種聲音強烈指責著他們拍攝「看不懂」的電影，因而導致商業電影黯淡無光。他認為：「這不是一種很奇怪的邏輯嗎？」因為從電影發展史上來看，以台灣商業電影成就的高峰期與低峰期而言，觀賞藝術電影的人總是固定的小眾客群。因此不論商業電影的發展好或壞，這些小眾客群都是不會受到影響而關注著藝術電影的。社會應該是要著眼於如何修正商業電影的缺漏，而非責備著這些藝術電影的導演與觀眾，藝術電影的票房與商業電影的票房是未有關聯的。

因此施佑倫銜接到紀錄片的問題，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分析著紀錄片的產業現況。他認為紀錄片就似藝術電影，不論台灣的電影產業發展好與壞，觀看的群眾就變動不大，用藝術電影或者是紀錄片關心社會的人就是固定的。因此，紀錄片本身並無飽不飽和的問題，而是自己是否能夠遵循著自己內心的想望與形式，不受市場輿論的去做、去拍攝。

學生如何踏入媒體產業

現今的媒體產業發達，每個人都可以隨手拿起手機拍攝影片、製作媒體，對於這個現象，施佑倫提到現今的確許多年輕學生喜歡製作短影音，並把這些成果上傳到 YouTube 等等的影音平台，而他認為任何的方式去關注自己想關注的議題、傳達理念都是可以的，就正如他所說的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所使用的方式，最重要的其實是要多加去思考被攝者及被攝題材，最適合的拍攝手法及形式。

關於如何踏進影視產業的這個問題，施佑倫說除了專業科系的學生以外，非本科系的學生當然也可以成為很棒的創作者，舉知名編劇及導演蘇照彬為例，作為一位非本科系但在影視產業獲得高成就的人物，理工方面的背景不但不是他踏入影視產業的阻礙，反而替他在編撰懸疑劇本的道路開創了他人無法輕易做到的里程碑。除此之外，他也常常跟自己的學生說，如果要走拍片這一行，分數不是最重要的，關鍵的是要拿出好的作品，因為媒體產業是利用實際成品、產品等等去呈現的，眾人所關注的是最後的成果而不是曾經的成績單。

施佑倫的話語中傳達了對於未來想要朝這一方面發展的學生許多鼓勵，但他同時也認為，有時候這樣的說法是不太公平的，很多學生在發展時會遇到很多現實層面的困難，例如經濟背景不佳、經費不足等問題，面對這些狀況，他說到最重要的是有不輕易放棄的決心，再來才是進一步解決遇到的困難，簡單來說，有了一定要去做的堅持，自己就會找到方式去達成。